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Macau Chinese

余振
劉伯龍
吳德榮著

澳門華人政治文化



吳志良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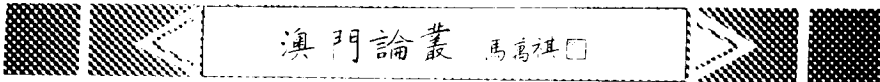
澳門論叢



澳門基金會
出版

5.59

吳志良 主編



澳門論叢 馬高祺

澳門華人政治文化

澳門基金會出版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吳志良主編

澳門論叢

澳門華人政治文化

作者：余振、劉伯龍、吳德榮

執行編輯：呂平義

助理編輯：姚翠玲

出版：澳門基金會

扉頁題端：馬萬祺

封面設計：李耀彬

排版：廣東省江門市江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澳門嘉華印刷公司

定價：澳門幣40元

主編者言

澳門有意識地引起大眾關注的系統學術研究起步較晚。隨着六、七十年代的經濟發展和八十年代政治、文化、社會發生的劇變，尤其是《中葡聯合聲明》的簽訂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和頒布，澳門和外地許多學者以及澳門居民，對澳門的歷史和現實的許多問題進行了討論，在政治、法律、經濟、文化、藝術、歷史、社會和民生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相當的成果。

澳門進入過渡期後，官方和民間的出版事業有質和量的飛躍，但較偏重歷史、文學和藝術，有關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的研究和探索的文章仍然零散，專著屈指可數，為研究澳門的學者帶來不便，影響了研究的深入和長足進展。因此，有必要將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和總結。編輯出版《澳門論叢》的構思由此產生。

雖然是整理總結，《澳門論叢》對歷史並不偏重，僅作借鑑。立足現在，放眼未來，建設澳門是我們的目標。我們一如既往，本着“思考澳門、研究澳門、推廣澳門”的原則，對澳門和外地學者有關澳門的個人專著和專題論文進行蒐集，以期推動和促進澳門問題研究的縱深發展，為關心澳門的人士提供一個可以觀察的窗口，為澳門居民更好地認識和了解澳門這座微型博物館創造條件，並為思索澳門問題的學者提供可以參考的材料，擴大視野和思路。

當然，萬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們的工作僅僅是零的起點，雖經努力，仍會存在許多不足之處，這一點，尚祈諒解。

借此機會，我們感謝本會信託委員馬萬祺博士為《澳門論叢》題字并提供部分贊助，感謝諸位作者和編者的大力協助，沒有他們的支持和信任，《澳門叢書》便不可能面世。我們更期望讀者提出批評和建議，使這套叢書更趨完善。

吳志良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自序

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於1956年首先採用“政治文化”一詞，並將“政治文化”界定為“一個政治系統(國家或民族)的基本政治取向”。按照阿爾蒙德的理解，政治文化作為長期形成的心理積澱，深藏在我們心中，並潛移默化地支配着我們的政治行為。

四分之三世紀之前，魯迅先生在他的不朽名著《阿Q正傳》，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國民性的“看客心理”和“奴才心理”的劣根性。研究中國政治文化的西方學者和華人學者，亦指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權威人格和順民心態，認為這是阻礙中國民主發展的主要因素。

澳門華洋雜處，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佔澳門人口百分之九十七的華人居民，不斷受到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民主思潮的衝擊。90年代的澳門華人政治文化，與傳統中國文化有甚麼分別呢？澳門的政治文化土壤，是否適合西方民主政制的植根生長呢？

為了進一步探索這個問題，我們於1991至1992年間，進行了五次問卷調查，訪問了一般澳門市民、大學生、中學生、登記選民、以及參與1992年立法會選舉的其中三個組別的候選人和助選人員。

這本書的調查研究，由本人策劃，同兩位澳門大學同事(劉伯龍和吳德榮兩位先生)一齊負責。調查研究進行期間，澳門政府普查暨統計司署提供有關澳門市民的資料，有關中學

給予熱心支持，澳門文化司署、澳門大學和澳門蔡氏教育基金會對該項研究提供贊助，在此一併致謝。

這份研究報告，原文用英文寫成，由本人和劉伯龍、吳德榮兩位先生執筆。中文本則由本人獨自執筆寫成。前者主要以不懂中文的學者專家為對象，後者則為澳門廣大讀者及關心澳門華人社會文化的國內人士服務，所以中、英文版本的內容略有出入。總的來說，英文版本比較注重理論和學術性的分析，中文版本則比較重視理論和實際政治、社會環境的關係。

這本書未經劉、吳兩位先生過目，因此本書的文責由本人自負。

最後，沒有澳門基金會吳志良先生的大力支持，本書不可能如期出版，在此謹致謝意。

余 振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作者簡介

余振，原籍廣東開平，一九四六年出生。一九七〇年畢業於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系，七六年獲美國夏威夷大學博士學位，主修國際政治。曾在美國馬里蘭大學、加拿大卡加利大學和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任教。於一九八七年始，任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教授。

曾於國際學術期刊發表有關亞洲包括中國、日本、香港和澳門政治論文三十餘篇。中文著作有一九九三年六月由香港廣角鏡出版的《澳門：超越九九》。

劉伯龍，原籍江西萬安，一九四九年出生於香港。一九八二年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獲經濟學碩士學位。一九八八年在比利時魯汶大學獲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主修國際關係。一九九〇年始，在澳門大學任政府與公共行政學助理教授。著作有《歐洲共同體、英國、比利時對華政策的比較研究》（一九八八年魯汶大學出版社），以及《澳門的國際地位》等數篇論文。

吳德榮，原籍福建，一九六二年出生於菲律賓。一九八五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政治系，八九年於同學系獲碩士學位。一九九〇年至九二年曾任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講師。現為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博士生。曾發表數篇有關中國、香港政治的論文。

澳門論叢



主 編：吳志良

執行編輯：呂平義

- 澳門華人政治文化
- 澳門縱談
- 澳門與澳門基本法
- 澳門經濟四百年
- 澳門經濟述評
- 澳門的視野
- 過渡期的澳門
- 中外學者論澳門歷史

目 錄

主編者言	吳志良
自序	(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對整個政治體系的政治取向	(26)
第三章 對政治體系輸入和輸出的取向	(47)
第四章 對自我政治角色的取向	(62)
第五章 澳門華人的選舉投票行為	(84)
第六章 大學生和中學生的政治次文化	(103)
第七章 政治活躍分子的政治次文化	(123)
第八章 結 論	(136)
附件一：澳門華人政治文化調查問卷	(146)
附件二：澳門立法會選舉投票調查問卷	(155)
編後語	呂平義

CONTENTS

Acknowledgements		(I)
Chapter I	Introduction	(1)
Chapter II	Political Orientations Toward the General System	(26)
Chapter III	Political Orientations Toward Input and Output Objects	(47)
Chapter IV	Political Orientations Toward Self as Object	(62)
Chapter V	Participation in Elections	(84)
Chapter VI	The Political Subcultures of Universit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103)
Chapter VII	The Political Subculture of Political Activists	(123)
Chapter VIII	Conclusion	(136)
Appendix I :	Political Culture Questionnaire	(146)
Appendix II :	Voting Behavior Questionnaire	(155)

第一章 緒 論

1.1 導 言

衆所周知，澳門政府並不是一個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它的正式和法定權力源自里斯本：澳門總督是由里斯本委任的。不過，跟鄰埠香港不同的是，澳門的主權從來沒有割讓給葡萄牙。1887年的中葡條約祇將澳門的管治權移交葡國；澳門的邊界從來沒有正式由中、葡兩國界定。澳門這個幾乎完全沒有自然資源的小港，日常所需包括最基本的食水及糧食都是倚靠中國大陸的供應。因此，雖然由葡國管治，澳門的自主權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於中國政府的。事實上，澳門政府一向沒有能力控制由大陸遷入澳門的人口。直至1991年，在中國政府的同意下，澳葡政府才在珠海——澳門邊界設立海關檢查站。

根據1991年的人口普查，澳門大約有固定居民354,000人^①。其中大約97%是華裔居民，2%土生葡人，^②1%由里斯本或葡國前非洲殖民地安哥拉、莫桑比克及葡屬果亞來澳工作的葡籍人士。土生葡人一般在政府機關工作，是中層領導和主管人員的骨幹；外來的葡萄牙人則多擔任上層領導與主管的職位。可以說，他們都是澳門的政治精英。可是，土生葡人跟外來葡人並不是水乳交融，毫無芥蒂的。很多土生葡人能說流利的廣東話（雖然很少能讀或寫中文），對澳門有強烈的歸屬感，視澳門為家。他們不容易亦不大願意融入外來葡人的圈子中。事實

上，澳門存在着兩個截然不同的葡人社交圈子——土生葡人和外來葡人。不過，他們亦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無論土生葡人或是外來葡人都很少與本地華人的社交圈子來往。因此，澳門的大眾政治文化很少受到土生葡人或外來葡人文化的影響。

澳門的華裔居民大多數由毗鄰的廣東省，尤其是中山縣遷徙來的。其中亦有相當一部份，估計大約5萬人，是從福建省遷來的。事實上，現居民中很少是原澳門居民的後代。當葡萄牙人於1553年首次踏足澳門，他們祇發現幾百個當地居民。^③由於大量的華人從鄰近的縣鎮遷入澳門，於本世紀初澳門的人口超過5萬。最大的一次移民潮發生於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時期。因為某種原因，澳門沒有被日本人佔領。大量的大陸及香港人湧入澳門，澳門成為他們的避難所。根據一個估計，戰時的澳門人口高峰期超過30萬。^④和平後，澳門人口急速下降，很多人遷回大陸或香港。據估計，1950年澳門的人口大約為18萬。^⑤

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澳門的人口幾乎停滯不前。自然人口的增長，被相繼離開澳門到香港或國外謀生的年青人所抵消。不過，到七十年代末期，由於中國大陸放鬆移民政策，澳門的人口再次急劇標昇。據估計，祇1979年就有大約4萬合法移民由大陸遷入澳門。整個八十年代，合法和非法遷入澳門的大陸移民總數超過10萬人。^⑥不過，大約四分之一的新移民最後遷移去香港或海外。因此，如上述，澳門的人口在過去幾十年來上落很大，極富流動性。事實上，不足四分之一的澳門成年人是本地出生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澳門的政治文化是中國政治文化的縮影，尤其是廣東和福建兩省的文化。

1.2 阿爾蒙德(Almond)和弗巴(Verba)的模式

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於1956年首先採用“政治文化”一詞,並將“政治文化”界定為“一個政治系統(國家或民族)的基本政治傾向”。按照阿爾蒙德的理解,政治文化作為長期形成的心理積澱,深藏在我們心中並潛移默化地支配着我們的政治行為。阿爾蒙德和弗巴(Verba)在《公民文化》一書中,認為政治文化即一個政治系統內的個人對於該系統的態度取向,可用認知、情感和評價三個概念來說明。^⑦這三個取向的對象或目標有四個:1.整個政治體系;2.體系的輸入功能(在政策流程中,所有個人、團體和程序對政府的需求和支持);3.體系的輸出功能(所有政策執行的內容);4.自我的政治角色(指個人作為政治系統成員的權利和義務的知識及信仰)。^⑧

阿爾蒙德和弗巴根據公民對政治體系、體系的輸入和輸出功能以及個人擔任的政治角色的認知、情感和評價的狀況將政治文化分為三種類型:1.“地域型文化”:即是指民衆對於政治制度、政策和其他政治目標的認知極為薄弱,甚至認為完全無法加以影響。具有這種政治文化特徵的社會大多仍處於部落、地方或村落文化狀態。2.“臣屬型文化”:是指民衆對於政治系統及其輸出有強烈的認知,但是僅微弱地感到此系統的重要性,而且個人的政治效能感很低。在這種政治文化氣氛下,民衆的政治角色尚祇是臣屬地位,或“順從者”,而不是自主地位。3.“參與型文化”:是指社會的成員對整個系統、政治和行政結構及運作過程有強烈的認知和態度取向;他們相信自己祇要努力參與就能夠影響國家事務。但是,阿爾蒙德和弗巴強調,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祇是某一種純粹形態的政治文化,而必然是兩類或三類文化的綜合體。當然,

必有一類居主導地位，構成該政治系統的主流政治文化。^⑨

據阿爾蒙德和弗巴從英、美、德、意、墨(墨西哥)五國的調查研究中得出的結論，真正能構成“安定的民主”(stable democracy)的政治文化必然是將傳統與現代兩類文化加以混合的文化。任何徹底摒棄傳統政治文化而重建現代政治文化的念頭都是不切實際的。優良傳統與現代混合的文化被稱為“公民文化”。“公民文化”是一組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說，有政治活動，但不致於去摧毀政府的權威；有政治的參與和輸入，但卻是溫和的；有政治紛爭，但卻是有節制的。總之，公民文化的內涵是守法、寬容、恕道和理性論事的多元文化。^⑩

這本書採用阿爾蒙德和弗巴對政治文化的定義及其理論模式。我們很想知道，通過實際調查研究，澳門是否具有“公民文化”。換言之，澳門有沒有適當的文化土壤實行一個“安定的民主”政制呢？

1.3 西方學者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

西方的社會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向來有濃厚的興趣。美國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對這方面的研究，更是其中的表表者。白魯恂的研究興趣主要是1949年後的中國政治。白氏認為政治文化是解釋中國政治現象不可或缺的要害，因為意識形態，尤其是帶有濃厚道德觀念的意識形態，在中國政治上一向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帝皇時代，儒家思想之所以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是因為“它符合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和一般老百姓的家庭及家族倫理規範”。^⑪因此，在傳統中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主要是受儒家的尊卑有序、上下有別的思想影響。同樣地，在當代中國，列寧主義和毛

澤東思想被領導和中國人民所接受並被視為最高的道德標準。白氏認為，中國統治者自古以來就懂得利用某種含有強烈道德意味的意識形態來鞏固他們的統治，使其政權合法化。¹²

漢學家墨士格(Thomas Metzger)則認為在中國政治文化中，道德標準與實際政治權威架構之間存在着緊張的關係。下屬對上級、擁有政治地位者的服從不是絕對的，而是根據在位者有否依據道德標準辦事而定。¹³不過，白魯恂不是不知道潛伏在傳統中國文化中的緊張關係。白氏認為中國有兩種不同的文化。在傳統中國，中國社會有着兩極的社會形態：一端是主流正統的儒家倫理，另一端是反主流的道、佛和民間通俗的信仰。根據白氏，毛澤東繼承了傳統的反主流或反叛文化，而鄧小平則較為溫和和低調，承繼了主流的儒家或士人文化。¹⁴白氏企圖用兩種文化論去解釋動盪的毛澤東時代(含文化大革命)和強調實事求是的鄧小平時代。白氏認為毛、鄧兩個時期都同樣具有“中國特色”。¹⁵很多人未必同意白氏對中國政治現狀的分析，但是他對中國傳統潛伏着的矛盾的精闢觀察，卻獲得很多漢學家的同意。

白魯恂進一步指出，在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中，潛藏着權威危機。根據白氏，當一個合法政權的文化和心理基礎受到現代化過程的衝擊，權威危機就會出現。¹⁶白氏提出警告，如果現政權的中國領導人，不吸取傳統中國統治者的教訓，繼續漠視人民的困境和要求，某種權威危機就會爆發。中國人民最終會唾棄一個顛覆無能的政權，雖然傳統上他們對權威依賴和崇拜。其他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亦指出在中國文化中存在着傳統與現代的不協調現象。¹⁷

白氏認為，中國的政治文化，有下列主要特徵：¹⁸

1. 一個由政治精英控制的、自足自給的政治體系；一般

公民或非官方人士對政府的影響力很少。

2. 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是主從關係，類似父母和子女之關係。
3. 強調道德說服力的功效和修身克己的重要性。
4. 強調融洽相處，缺少官方認可的“反對黨”。
5. 缺少政治上“平等”的觀念；以“萬能政府”為理想型的政府。
6. “朋友”和“敵人”之間界限分明。
7. 傾向附和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
8. 特別注重人際關係。
9. 強調團結和安定。
10. 意識形態在政權的認可性上扮演重要角色。
11. 政治上通權達變、因時制宜。
12. “兩種文化”的特徵。
13. 對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文化感到自豪。
14. 相信歷史循環論，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概念。

很明顯，在白魯恂眼中的中國政治文化，十分酷似阿爾蒙德和弗巴所說的“地域型文化”和“臣屬型文化”的混合。在中國政治文化中，缺乏現代政治“參與者”的觀念和傳統。換言之，根據白氏，中國政治文化並不適宜民主政治的發展。白氏並認為中國政治文化根深蒂固，有其永久性及其不可改變性。當然，白氏並不是唯一強調中國文化的連續性的學者。事實上，大多數漢學家或中國問題專家都同意中國文化的要素在過去幾千年來都一脈相承，很少改變。

很少人會懷疑白魯恂對研究中國政治文化的成就和貢獻。不過，白氏自己亦承認，他的研究成果並不是建基於實證調查的工作上，而是根據他個人的觀察和推測。¹⁹白氏並沒有